昆明学院学报　2012，34(4)：81～85　　CN 53－1211/G4　ISSN 1674－5639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语言学】

# 云南山区多民族杂居村落的语言接触

刘　青
（云南民族大学 民族文化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多民族杂居村落遍布云南全境。在滇西北，它们的形成多在明代以后。多民族语言因族群之间的共同生活而变得兼用和混杂。这种兼用和混杂又因相互的通婚而强化。当旧有的生活方式被打破，多民族杂居村落的语言又在多方因素的作用下，向着汉语方言和民族共同语的方向变异。

**关键词**：云南山区；多民族杂居村落；语言接触；多民族语言；多语并用
**中图分类号**：H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2)04－0081－05

## The Multilingual Contact about Mixed-ethnic Villages in Yunnan Mountainous Area

LIU Qing
(Institute of Nation Culture, Yunnan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Yunnan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The mixed-ethnic villages proliferate the entire Yunnan Province, and in the northwest, the villages formed mainly Ming Dynasty. In such villages, the multi-ethnic language becomes common and is mingled with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the phenomenon is clearer because of intermarry. When the old the life style is changed, the multi-ethnic language varies towards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this ethnic common language with the functions of mangy factors.

**Key words**: Yunnan mountainous area; mixed-ethnic villages; language contact; multi-ethnic language; multilingual use

多民族杂居村落遍布云南各地。无论是云南与川藏交界地区，还是临缅、临越边境，甚至滇中经济核心地带，都有很多这样的村落。它们多为群山环绕，即使在昆明，也离城中心的喧嚣较远。虽然多民族杂居村落的语言接触类型有异，但却有一些与人文生态环境相关的规律性的东西。本文出自近几年来笔者的田野调查、文献资料检索以及心得，虽不免有些以偏概全之嫌，但也算是有创新之处，权作抛砖引玉之用。

### 一、族群迁徙与语言接触

杂居村落有汉族与其他民族的杂居村落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杂居村落。汉族大规模往云南移民是在明代以后。早期零星过来的中原移民，由于规模不大，与当地民族杂居，基本已被同化到其他民族中了。因此，现仍存在的多民族杂居村落形成的历史一般都不太长，大致都在明代以后，形成的原因也各有不同。滇西北是多民族杂居村落较为密集的地区。2010 年 1 月和 8 月间，笔者一行人曾两次深入云南丽江玉龙县塔城乡和迪庆维西县塔城镇的多民族杂居村落。就地理位置而言，两塔城彼此相连，曾都是“藏彝走廊”多民族汇聚迁徙的重要区域，至今仍是藏缅语多个少数民族的杂居之地。不同只在于，丽江塔城人口最多的是纳西族，而维西塔城则是藏族。

丽江塔城的洛固村有纳西、藏、傈僳、普米、白等几个民族。在丽江塔城，我们曾就民族迁徙时间问题请教过当地两位有名的宗教人士。洛固村的和学礼老人是藏传佛教的存世高僧，本人也是藏族。他介绍说，自己祖先迁到塔城已有十代，如果以一代 25 年推算，时间当有两百多年。在洛固的纳西族中，约有 80 户自称是“路鲁”(IvHv)的纳西人，散居于各个自然村落中。相传他们是四个纳西古氏族梅、禾、束、尤中梅氏族的后裔，其祖先从南山(今丽江玉龙县黄山镇南溪一带)迁居塔城依陇，一部分从依陇又迁到洛固，多是因躲兵等原因而迁居。据调查，路鲁的祖先从南山迁到依陇已历四代，从依陇迁到洛固已历三代。①[1] 依陇的纳西族和明老东巴清楚地述说了祖先迁徙的经历：祖先过来已经两百多年，原住在四川青海中间，后那里打仗就来到四川

**收稿日期**：2012－07－2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滇西北高山峡谷区多民族杂居村落语言与文化解除关系研究”(09YJAZH038)；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云南边境地区民族语言的生态环境研究”(YB201141)
**作者简介**：刘青(1966—)，女，山东栖霞人，教授，语言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和民族语言比较研究.

① 引自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王磊同学硕士学位论文。王磊曾在玉龙县洛固村做过三次田野调查，2010 年 1 月与笔者同行是第三次。

木里,从木里再到宁蒗永宁,再到白沙,后纳西、摩梭打仗,又从白沙住到木老爷那里(木府大门下面的忠义市场)。和明这一支搬到丽江长水,后搬到泰安的木苏。住在木苏的那一代有九个儿子:一个住到四川盐津,一个住到德钦,一个到贡山,一个到中甸三坝,一个到四川木里,一个到鹤庆的西屯,一个到拉市,两个到南山。住在泰安的一家有五个儿子:两个到拉市,一个到丽江的南口,一个来塔城的依陇,一个住原地。过了几年,除了来这里的那一家,从泰安又来了 19 家,依陇有 10 家。从这个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先民间接迁徙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历时一千年以上。在这一族群迁徙的过程中,很可能已与其他民族语言发生过接触。但就丽江塔城地区藏语与纳西语的接触来说,顶多是有两百多年的历史。除纳西族、藏族外,洛固村其他民族的人数很少,他们与人口多数民族的语言接触是单向的,也就是说他们只受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

在金沙江另一面的维西塔城,我们调查了被称为“玛里玛萨”的居住群体。“玛里玛萨”意为木里摩梭,本来是指从木里迁到维西塔城的摩梭人,后因长期与藏、傈僳等民族接触,“玛里玛萨”又成了一个地域文化的代名词。在云南迪庆州,还流传着傈僳玛萨、藏族玛萨之类的称呼,用于指与玛里玛萨人杂居的藏族和傈僳族。玛里玛萨人主要居住在云南省迪庆州维西县塔城镇腊普河畔海尼与柯那两个民族行政村,包括有 14 个自然村落,其中海尼村 10 个,柯那村 4 个,共两千多人口。玛里玛萨人迁徙的时间,据上个世纪 50 年代的民族识别调查,当时玛萨老人有个比较一致的说法就是,其祖先是一个叫阿额黑的头人的奴娃,来维西有七代,也就是三百年左右。[2]但《维西县志》的记载则是:据世代相传,玛里玛萨的祖先原住在“拉塔堆”(今四川盐源左所),由于明代木氏土司连年征战,他们纷纷外逃避乱,陆续来到县境腊普河谷。[3]163 虽然对迁徙的原因有不同的解释,但时间上却差不多一致。我们曾就此问题请教过与玛萨人杂居的藏族发音人。他猜测他们在本地居住的时间可能是两百多年左右。与玛里玛萨人相比,藏族在维西县境居住的历史却要早得多。在史籍文献中,藏族常被称为“吐蕃”、“古宗”,有时也称“西番”。唐初,县境为吐蕃铁桥节度使地,居民中的藏族成分比较多。明代木氏土知府与藏族农奴主在县境长期进行争夺战,最终虽然木氏取胜,但作为土著居民的藏族人民群众,依然大多居留了下来。清代设置的维西厅,曾是当时有名的藏区之一,藏族人口占居民的半数左右。而据 1957 年的统计,全县藏族共 27500 人,60% 以上都集中在塔城乡内。[3]175-176 发音人所说的时间,倒是符合木氏土司与藏族统治者争战的时间。他的祖先也许就是那时来塔城的。傈僳族在塔城居住的时间也较早。据文献记载,唐代的铁桥城附近居住着施蛮、顺蛮部落。现代一些学者认为,施蛮、顺蛮乃是傈僳族的先民[3]147。而铁桥就在塔城境内。藏族、傈僳族的居住时间早于玛萨人,从玛萨人关于语言的传说中也可以得到证实:听老人说,古时候教语言,玛萨人迟到了,其他人已经散会,只好跟藏族学一点,跟纳西族学一点,跟傈僳族学一点。有些人故意教些丑话,所以玛萨人表达一些正常意思的词,在其他族的语言中往往有猥亵的含义。[4]由此可以推知,这个以玛里玛萨人为主体的玛萨文化圈,是明代以后经过语言文化的接触与融合慢慢形成的。

云南怒江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丙中洛乡是一个有名的多民族杂居地区。丙中洛乡因住丙中洛村而得名。丙中洛原称“丙中”,藏语意为藏族寨。[5]25 下表 1 是丙中洛乡所辖各村委会各民族人口最新统计资料。从此表我们可知,丙中洛乡现有汉、彝、白、苗、傈僳、纳西、藏、怒、独龙等十多个民族,但在语言接触中占有主体地位的只是汉、傈僳、藏、怒、独龙等几个民族的语言。

**表 1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丙中洛乡各民族人口统计** 人

| 项目 | 汉族 | 彝族 | 白族 | 苗族 | 傈僳族 | 佤族 | 纳西族 | 藏族 | 怒族 | 独龙族 | 布依族 | 其他 | 总计 |
|---|---|---|---|---|---|---|---|---|---|---|---|---|---|
| 秋那桶 | 7 | 1 | 2 | | 194 | | 5 | 148 | 895 | 14 | | | 1266 |
| 双拉 | 23 | 1 | | | 407 | | 6 | 20 | 1063 | 175 | | | 1695 |
| 甲生 | 42 | | 4 | | 480 | 1 | 2 | 115 | 535 | 88 | | | 1267 |
| 丙中洛 | 55 | | 3 | 2 | 859 | | 2 | 225 | 681 | 71 | 1 | 4 | 1903 |

贡山怒族是怒江峡谷最早的土著居民,早在一千多年前他们就在贡山繁衍生息。[5]83 而住在贡山的独龙族自称阿龙,从其语言、习俗、神话传说及生产生活方式来看,他们与独龙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贡山的怒语与独龙语大部分能相通,语音、词汇相同的占 60% 左右,语法关系也完全相同。[6]据《云南省志卷五十九: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志》记载:怒族的四个支系中,“贡山阿龙支系与独龙族使用相同的一种语言,其他三个支系分别使用三种独立语言。”[7]杨浚先生也曾较为肯定地指出:“现在人们都已意识到,从碧江县北部开始,包括福贡、贡山在内的怒族,实际上与独龙族为同一族源,语言也基本相

同。”[8]这样,贡山的怒语和独龙语基本可以合二为一,语言接触差不多就是傈僳、藏、怒语加上后期与汉语之间的接触。

傈僳族进入怒江是明代以后。15 世纪(明嘉靖至万历年间),纳西族木氏土司与吐蕃统治集团为了争夺滇、川、藏交界地区的统治权而进行了长久的争战,傈僳族人民因不堪兵丁劳役和战争之苦,在乔氏族首领“括木必”的带领下,部分人渡过澜沧江,翻过碧罗雪山,西迁怒江。进入 19 世纪,以恒乍绷等为首的几次傈僳族大起义被清王朝镇压以后,又有 17 个氏族相继进入怒江。[5]100

藏族进入怒江一开始是源于宗教移民。1766 年,松娄喇嘛在丙中洛建成了飞来寺,并分别从德钦、中甸、西藏招来 75 户藏族。随着藏族人口增加,喇嘛教徒的增多,喇嘛寺的势力也逐渐变得强大起来。[9]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天主教在丙中洛开始传播,也从德钦移来 70 户藏民。从丙中洛翻过雪山到德钦大概需要两天的路程,而从丙中洛前行 20 km 翻越雪山到维西,当地人也只需一天的时间,所以当地民族来往于雪山之间的迁徙流动比较普遍。我们曾访问过著名的丁大妈,她说:“我妈妈 20 多岁从德钦过来,过来的时候我 3 岁,应该是 1944 年。那时候,我爸爸信佛,给寺庙雕刻,妈妈则专门给土司推豆腐。”“我爷爷、祖爷爷是南京那边的汉族,清朝过来的。妈妈是藏族,外婆是迪麻洛的,外公是教堂管理人员。外婆到德钦玩,外婆的姐姐在教堂当修女,把外婆介绍给了外公。”丁大妈家的迁徙虽然也与宗教有关,但主要由于通婚和谋生。像这种零星的迁徙所占人口比例应该也不少。比如,我们在甲生村重丁组的丙中洛中学后面见到一块天主教信徒的墓碑,写明逝者生于 1931 年,藏族,德钦县人,约 1948 年迁入贡山。我们还在小街上遇到几个来自迪麻洛的藏族,也许他们并未入当地的户口,但至少证明从迪麻洛入迁丙中洛很方便。

总结以上所述可以知道,贡山现有的多民族杂居局面是清代以后形成的。多民族杂居造就了当地民族多语并用的语言天赋,同时也形成了语言之间相互混杂的状态。藏族发音人张美菊阿姨告诉我们:“这里的藏族与德钦、迪麻洛不同,这边的藏族、怒族话差不多一样,因为这里原来是怒族地区,从中甸迁过来的时候怒族人是大多数。”“现在家里傈僳话、汉语方言经常说,藏话也说,家里哪个族的人来了,就讲哪族话。”多民族杂居村落的人说话都很随意,藏语中夹着怒语,怒语中夹着傈僳语,反正大家都听得懂,有时候为了开玩笑,故意一句话夹着几种语言说。但多语并用毕竟增加记忆负担,所以学校里的孩子一般选择较为简单的傈僳语作为交流语言。

## 二、异族通婚与语言接触

虽然不同民族间的婚姻在解放前并不普遍,但我们所研究的少数民族杂居村落,异族通婚却是在解放前就已存在。异族通婚是语言深度接触的关键因素。如自 1253 年以后进入云南的蒙古族,由于长期与当地白族和彝族等民族朝暮相处、相互通婚,多数已被当地民族融合。即使保留蒙古族身份,他们的语言也已经变异。现居云南玉溪市通海县兴蒙乡自称“卡卓”的蒙古族就是如此。据研究,卡卓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10—11]云南的蒙古语之所以发生如此大的变异,原因是蒙古军攻打云南进来的都是男性,驻守下来与当地女性结婚,孩子受母亲语言和生活习俗影响,如此反复几代,原有的蒙古语言文化自然面目全非。我们所调查的多民族杂居村落,其祖先多为拖儿带女式的迁徙,语言接触虽然还没有达到变异的程度,却已杂交得非常厉害,自然也与通婚有关。在上述丽江塔城洛固村的和学礼老人家中,他本人是藏族,他的妻子是傈僳族,他的儿媳又是纳西族。而在维西塔城镇海尼村前老支书和玉才老人家中,他本人是纳西族玛里玛萨人,妻子是藏族,儿媳又是傈僳族,家里玛萨话、傈僳话混着说,出去又经常说藏语。我们查了一下海尼村与人口有关的记录册,两个、三个民族结合的家庭随处可见。例如:和志才家,本人是纳西玛里玛萨人,妻子是傈僳族;和国清家,父亲是纳西玛里玛萨人,母亲是藏族;杨正清家,本人是藏族,妻子是纳西玛里玛萨人,儿媳是傈僳族;等等。据玛里玛萨人称,玛里玛萨文其实是一个学过东巴的丽江纳西族上门女婿带来的,因此玛萨人并不承认有什么玛里玛萨文,认为就是东巴文。我们对贡山县丙中洛乡丙中洛村贡当的 30 个家庭的民族成分进行了统计。为了尊重当地民族,30 个家庭我们用编号代替,具体情况如下表 2:

**表 2　丙中洛村 30 个家庭的民族成分统计**

| 编号 | 家庭人口/人 | 民族成分 | 民族数量/个 |
|---|---|---|---|
| 1 | 3 | 汉、傈僳 | 2 |
| 2 | 1 | 傈僳 | 1 |
| 3 | 6 | 藏、怒 | 2 |
| 4 | 4 | 藏、怒 | 2 |
| 5 | 4 | 藏、怒、傈僳 | 3 |
| 6 | 4 | 傈僳 | 1 |
| 7 | 4 | 怒、傈僳 | 2 |
| 8 | 6 | 傈僳 | 1 |
| 9 | 2 | 怒、傈僳 | 2 |
| 10 | 6 | 怒、傈僳 | 2 |
| 11 | 4 | 傈僳 | 1 |
| 12 | 1 | 傈僳 | 1 |
| 13 | 2 | 傈僳 | 1 |
| 14 | 3 | 傈僳 | 1 |
| 15 | 4 | 傈僳 | 1 |
| 16 | 5 | 傈僳 | 1 |

续表 2

| 编号 | 家庭人口/人 | 民族成分 | 民族数量/个 |
|---|---|---|---|
| 17 | 5 | 藏 | 2 |
| 18 | 5 | 傈僳、怒、藏 | 3 |
| 19 | 3 | 藏 | 1 |
| 20 | 6 | 藏、傈僳、怒 | 3 |
| 21 | 5 | 怒、藏 | 2 |
| 22 | 2 | 藏、傈僳 | 2 |
| 23 | 3 | 傈僳 | 1 |
| 24 | 6 | 傈僳、藏 | 2 |
| 25 | 2 | 藏、傈僳 | 2 |
| 26 | 3 | 傈僳 | 2 |
| 27 | 9 | 藏、怒 | 2 |
| 28 | 4 | 藏 | 1 |
| 29 | 5 | 藏、怒 | 2 |
| 30 | 1 | 独龙 | 1 |

贡当本来是藏族村落,1958 年以前有 30 户藏族,没有其他民族居住。农业合作社以后,政府从山上迁下 20 户傈僳族。但从表 2 来看,单一藏族的家庭却很少,只有 3 户,其他都是与怒族、傈僳族混合的家庭。这恰好可为丙中洛藏语中的多语混杂做注解,与上述的调查资料相印证。

## 三、生态环境与语言接触

语言的首要功能就是满足人类的生存需求,因此语言与生俱来就带有生物性特征。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说,所有适应均源于自然选择:“虽然有很多因素会影响进化,但只有自然选择会导致适应,即产生复杂且精细的结构以使有机体在多样的环境中生存和繁衍。有机体并非是被设计成现在的形式,而是他们的祖先通过有利于繁衍的变异而形成的”[12]。站在生物学角度审视语言,一切外因引起的变异也均源于生存利益的驱使。多民族杂居村落的形成,多是源于各族人们求生的欲望——或为躲避兵灾,或为躲避沉重的赋税徭役,或为躲避官府追杀,或为躲避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等等。而在山谷之中形成这样一些村落,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大山提供了易于生存的动植物生态。滇西北地区有 13 个植被类型、27 个植被亚型、170 个群系,分别占云南植被类型的 86.7%、植被亚型的 67.5% 和群系的 63.4%.[13]根据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馆藏标本记录和一些公开发表的科技文献,关于滇西北的鸟兽标本记录有 5 575 条、文献记录有 2 551 条,共记录兽类 165 种,鸟类 455 种。[14]这样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使人们差不多靠采集和狩猎就可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而高俊的山峰,茂密的丛林,滔滔的江水,又成了阻挡外敌入侵的天然屏障。所以,这些高山峡谷区多民族杂居村落的语言,由于交通不便,与外界接触较少,往往保留了一些古老的形式。但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特征丧失,也意味着语言环境的开放。当古老的生活方式被打破的时候,语言就会朝着新的方向变异。

汉语影响维西县境的时间较晚。境内汉族人口,从清朝才开始大量流入。从玛里玛萨文我们就可以看出,从汉文借形的字很少。据《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记载,从清代至今的汉族移民主要聚居于县城,其次多集中在设讯置塘的地方,此外则在一些自然及交通条件较好的村落居住。[3]157多民族杂居村落一般都是交通不便,很少有汉族人口,但汉语却以巨大的强势冲击到高山峡谷。我们所调查过的高山峡谷中多民族村落的人们,几乎都可以用汉语直接交流。这里头涉及到人文生态的许多因素,诸如生存利益驱使、媒体作用、民族教育政策的改变以及交通、通讯状况的改进等等。比如,海泥村的玛里玛萨人非常勤劳,每天都在山里田间忙碌着,很少有围着篝火歌舞升平的景象,晚饭后的电视节目几乎是其唯一的休闲娱乐,这样在不自觉的状态下接受了汉语,就连多年都没走出山村的老人,都可以说几句汉话。近年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等原因,山里的孩子越来越少,为了节约资源,同时又能够更好地利用师资力量,山区民族地区的孩子开始接受封闭式的教育。维西塔城镇的孩子,到了七岁以后,都被送到塔城小学读书,他们在学校住宿,生活由老师负责,每天都伴随着汉语。以前每个少数民族村落都有自己的小学,甚至一个年级只有一个学生,教材要老师先用民族语翻译,从一年级到三年级都是这样的双语教学。但现在已经不需要了,民族地区的孩子一开始就听得懂汉语,而教师现在也多半是汉族。

贡山境内原来也没有汉族,汉族大都是在殖边队进驻怒江地区以后才逐渐进来的。[5]129据我们观察,汉语对贡山各民族语言的强大影响主要源自旅游经济、学校家庭教育和媒体作用。正像那个给丙中洛人民带来经济实惠的记录片《德拉姆》所描述的,丙中洛的百姓很多都怀着走出大山的梦想,至少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是这样。2011 年 7 到 8 月间,我们在丙中洛乡甲生村委会形它组做语言调查时惊奇地发现,怒族家庭跟他们的学龄前儿童对话用的是汉语。清晨,村庄从睡梦中醒来,录音机里便响起嘹亮的汉语流行歌,伴随人们进入一天的活动;傍晚,人们回到村庄,又传出了电视台播新闻和电视剧的声音。另外,乡镇上做各种生意的多半都是外地的汉族,人们每天都在跟汉语打交道,小学初年级也基本不需要双语教学。实际上,我们调查的其他高山峡谷中的多民族村落也大致如此。而且,通婚也不再是本地各民族之间,而是地区之间。在丙中洛,除了娱乐场

所,很少能见到适龄的年轻女子。听当地的藏族老人说:这里的女孩子更希望嫁到广东、江浙、四川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那些嫁到外地的女子,她们的孩子也不再说民族语。走出大山后,只有见到本乡的人才说母语,民族语自然就会退化。

## [参考文献]


[1]王磊.丽江塔城洛固村东巴教与藏传佛教的变迁与交融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

[2]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三)[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34.

[3]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

[4]刘青.玛里玛萨人的宗教文化与民族接触[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2):60-63.

[5]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6]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概况编写组.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概况[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34.

[7]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云南省志卷五十九: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527.

[8]杨浚.南诏浪峨人苗裔追踪考察报告[G]//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怒江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六库:[出版者不详],1987:11.

[9]陶天麟.怒族文化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127.

[10]和即仁.云南蒙古族语言及其系属问题[J].民族语文,1989(5):25-36.

[11]和即仁.关于云南蒙古族卡卓语的形成[J].民族语文,1998(4):51-54.

[12]巴顿N H,布里格斯D E G,艾森J A,等.进化[M].宿兵,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3.

[13]黄娟.滇西北植物多样性特征[J].云南林业科技,2000(4):42-45.

[14]任国鹏,河远辉,朱建国.滇西北动物保护优先地区评估——一种基于物种的快速评价体系[C]//第六届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利用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出版者不详],2004:17-27.


(上接第80页)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景颇族的礼仪有的已经消失,有的正在消失,依存于仪式的念词也会逐渐消失或融入其他文体,但景颇族对好日子的期盼、对人们的祝福、对孝道的强调、对邻里关系的重视不会因此而消亡。事实上,念词所蕴含的景颇族的人生信仰、道德观以及价值观早已凝固成景颇族的习俗,转化为景颇族的行为准则,从这个意义上讲,念词并不会消亡,它会以其独特的方式继续对景颇族的社会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 [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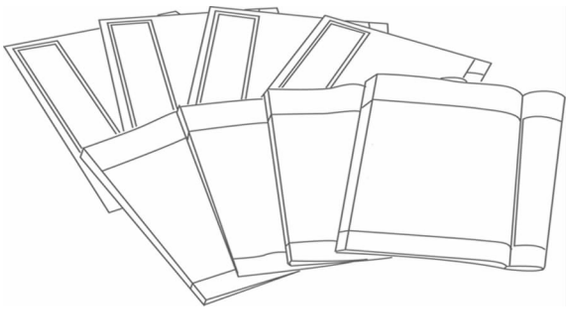

[1]景颇族简史编写组.景颇族简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37-138.

[2]刘刚,石锐,王皎.景颇族文化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3]张建章.德宏宗教[M].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1992:41-44.

[4]石锐.景颇族刀耕火种文化的变迁[G]//景颇族研究:第一辑.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

[5]石锐.景颇族传统祭词译注[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

[6]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土家、景颇、羌、普米、独龙、阿昌、珞巴、门巴族文化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44.

[7]刘稚,秦榕.宗教与民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26.